



人民公仆

A MAN OF THE PEOPLE

《瓦解》作者 **阿契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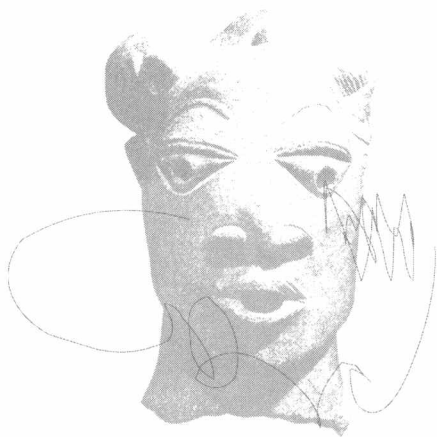
非洲现代文学之父

在他的伟大面前

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
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惭愧



Chinua Achebe



人民公仆

A MAN OF THE PEOPLE

Chinua Achebe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By Chinua Achebe

尧雨 译

A MAN OF THE PEOPLE by CHINUA ACHEBE

Copyright: © 1967, 1989 BY CHINUA ACHEB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MMA SWEENE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8) 第 5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公仆/[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Chinua Achebe) 著; 尧雨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5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 A Man of the People

ISBN 978-7-5366-9790-4

I. 人… II. ①阿…②尧… III. 长篇小说 - 尼日利亚 - 现代

IV. I43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6016 号

人民公仆

RENMIN GONGPU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著

尧雨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陈 黎 刘瑞兰

封面设计: 徐婕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 × 1280mm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20千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

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 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 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 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代总序）

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社会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

——题记

一、比夫拉知识分子

在当代的国际文坛，钦努阿·阿契贝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他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因为他第一次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他还在《远景》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因为他不屈不挠地就全球和祖国尼日利亚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2007年，他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因为“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

路。”2002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哈贝马斯，在他之后获奖的则有苏珊·桑塔格、帕慕克等。

钦努阿·阿契贝生于1930年的尼日利亚，属于伊博族，家庭信奉基督教；尼日利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则为约鲁巴族人。尼日利亚共有250多个民族，国内的三大民族分别是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伊博族散布于尼日尔河和クロス河之间，占有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部落时期，伊博族一直没有建立严密的政府组织，每个村落各自为政，与外界隔绝，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由于伊博族的封闭和强悍，曾被殖民者诋毁为“耽于吃人肉的恶习”。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伊博族的很多人逐渐信奉了基督教，并以注重教育、发展经济而闻名。

上世纪70年代，萨特曾经说过，假如他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文学工作，而应该做医生、司机等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以饥荒为作战手段。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国内部族冲突加剧，伴随着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1967年内战爆发，史称“比夫拉战争”。血腥的“比夫拉战争”使尼日利亚全国死亡300万人，其中100万死于饥荒。这场战争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建立，并引导全球社会开始关注非洲饥荒问题。

钦努阿·阿契贝就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战败的一方，内战后被边缘化的伊博族。

战争期间，钦努阿·阿契贝被迫离开在尼日利亚广播公司的工作，先为伊博族的“比夫拉政府”工作，后在美国从事教书和写作。作为一个作家，他亲历了尼日利亚剧烈的社会动荡——部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尼日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然后是“比夫拉战争”，然后是战争之后依旧动荡不安、军事冲突不断的尼日利亚和西部非洲。政治伴随着他的文学创作，他曾经说过：“一个非洲作家如果试图避开巨大的社会问题和当代非洲的政治问题，将是十分不恰当的。”因而，钦努阿·阿契贝的全部文学创作，就是展现尼日利亚的社会变迁，比如著名的“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动荡》(No Longer at Ease, 1960)、《神箭》(Arrow of God, 1964)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 1966)；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Girls At War, 1972)、长篇小说《荒原蚁丘》(Anthills of the Savannah, 1987)以及评论文集《创世日前的黎明》(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Essays, 1975)、《尼日利亚的不幸》(The Trouble with Nigeria, 1984)。这其中，尤以他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最为著名，可谓“史诗”，表现了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尼日利亚至尼日利亚独立时期的全部历史——《瓦解》的主题是殖民者的到来和伊博族社会的瓦解，《动荡》叙述了一个伊博族青年在殖民者“创造”的城市文明中的茫然，《神箭》描述了基督教对尼日利亚部落文明的蚕食，《人民公仆》讲述了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以部族为单位的“选举政治”的丑陋。

二、天鹅之歌

然而，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因为中国和尼日利亚一样，自19世纪起开始遭遇殖民主义的战争，旧的社会体制轰然倒塌，血腥的内战使民族分裂……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文学强调政治性和社会性，我们曾经把钦努阿·阿契贝目为“亚非拉兄弟”；如今，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些学者又将他的作品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永远比政治复杂，甚至比社会复杂。以上两种解读，实际上降低了钦努阿·阿契贝。钦努阿·阿契贝固然关注政治与社会，关注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的掠夺和破坏，然而，这些问题不是他作品的真正“主题”。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的表层之下，他所关心的，依旧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人有何为？

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瓦解》创作于1958年（两年后尼日利亚赢得独立），该书出版之后，获得了英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布克奖。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英雄如何走向末路。该书题词引用了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名句：“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这首诗名叫《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在此多引用几句：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袁可嘉译）

在叶芝写下这首诗的大致同一年代，居住在清华园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逾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在《瓦解》的结尾，主人公奥贡喀沃以一种为部落所不齿的方式结束生命，自缢于树上，“他的死尸是邪恶的”，“污秽了土地”。

就奥贡喀沃的自杀来说，殖民者的到来和侮辱，仅仅是一个外部因素；导致他选择自杀的深层原因，是部落坚守千年的文化与道德在溃散；促使他走向自杀之路的，则是个人的“暴怒”性格。

在钦努阿·阿契贝笔下，英国殖民者的到来，给伊博族的部落文明以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部落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已经出现裂缝，慢慢溃散。

小说的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一个顽固、易怒的人，他是部落的英雄，固执地坚守着部落的文化和律法，辛勤地种植木薯，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并且在部落中享有盛誉，在祭祀的时候充当“神的代言人”。为了这种坚守，小说中，奥贡喀沃两次挥刀斩人。第一次，在部落的复仇仪式上，他挥刀砍死了自己的养子——一切从此刻开始瓦解，“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喝醉了酒的巨人，在用蚊子的脚走路。他的头上不时感到一阵发冷，全身也跟着哆嗦起来”，家庭和儿子永远没有原谅他（小说的后半部分，他的儿子信奉了基督教，这给了他致命一击），部落中的人对他的残酷也感不满，“但是如果神说我的儿子应该被处死，那我既不去争辩，也不去做执行人。”）第二次，在部落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向白人宣战：“我们所有的神都在哭……因为他们受到了可耻的亵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恶魔连根铲除……”，挥刀砍死了白人的信使。在执著地坚守部落律法和维持自己的“强大”的同时，他没有察觉，部落的律法和文化，社会的结构和人心，已经在悄悄改变。这一改变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三、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

如果仅有时代变迁的主题，钦努阿·阿契贝依旧是一个二流作家。《瓦解》之所以卓越，在于钦努阿·阿契贝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甚至是二三流文学的唯一主题，所谓英雄和美女的故事是也。然而，《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对古希腊悲剧英雄的复兴。奥贡喀沃是一个“暴怒”的人，他在维持部落律法的同时，也在冲撞律法——“他的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惊慌失措地从自己的茅屋里跑出来，哀求他，提醒他这一周是神圣的。可是奥贡喀沃打起人来，是一不做二不休的，甚至于连神都不怕。”因为在圣洁的日子对神的冒犯，他被部落放逐。在这一刻，个人的悲剧命运，就与部落衰颓的命运融合为一，纠缠在一起，走向屈辱的终结。小说的语言始终是克制的，奥贡喀沃的命运具备一种古典美：庄严肃穆，简洁，沉稳，清晰。在历史的进程面前，黑非洲文化的衰颓不可避免，英雄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唯有悲剧主题，文学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悲剧主题中展现个人命运不可逆、不可选择的历程，英雄的形象才得以成立；唯有在文学所描述的个人命运中注入悲剧的因子，个人的命运才得以在文学上成立。

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尼日利亚一样，均处于传统文化与道德溃散、新的文化与道德建立的时代，也就是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钦努阿·阿契贝引用的叶芝名诗，“一切都四散

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描述的是基督教文化的溃散。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描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溃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则描述了整个西方文化和道德的溃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对于传统文化，钦努阿·阿契贝并没有赞美和哀惋。甚至在《人民公仆》中，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开篇就以嘲讽的笔触描述了“猎人协会仪式”（西部非洲的某些部族对英雄的欢迎仪式），随即在小说的展开中批判了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钦努阿·阿契贝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衰颓的过程，而不是这一文化与道德好与坏的问题。无论好坏，钦努阿·阿契贝以及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都浸透着这一文化的残余因子，成为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如同他的小说中俯拾皆是、随处可见的部落神话、歌谣、谚语。身为传统文化与道德中人，面临这一文化溃散的不可逆命运，人的可做可为，实际上是很少的。“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就是钦努阿·阿契贝笔下的奥贡喀沃。

王来雨

2008年6月4日于广州

我那时是阿那塔语言学校的一名教师，南加先生是来阿那塔访问的。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

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

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到阿那塔后，就住在语言学校。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 M.A.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但是，在那政治生活沸腾的时代，村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这个演讲会。学校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许多村民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在讲台下面。我朝会场上望了一眼，便决定待在外面——至少暂时待在外面更好一些。

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

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崇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对姑娘们的跳舞，我可以不去理睬，而“留声机”的歌声却不得不听。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像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她称颂他的名望，说即使走遍天下、扬名海外、与世无争的游侠骑士对他也不能不生嫉妒之心。自然，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不记得上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们像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不时会有两个人脸对着脸行军人礼，并一同拍击枪身，拍拍左面，又拍拍右面，拍完右面，又拍左面。母亲们紧紧抓住孩子，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拉走了。偶尔会有一位猎手瞄准远处的棕榈树，一枪打断粗实的筋叶。于是，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喝彩。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他物品一样，四年里翻了好几番。

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蹦蹦跳跳，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向那位使全国掉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我渴望一个奇迹，渴望一声如醍醐灌顶般的雷鸣，能驱散这一荒谬可笑

的庆典，好向这些卑微不幸的人讲述一两件真事。当然，这样做会是徒劳的。他们不仅愚昧无知，而且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曾利用他的地位大发横财，他们却会反问你（我父亲也这样问过）：“你是不是以为这样一个聪明人会把他走运时吞进肚里的美味佳肴再吐出来？”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像还挺受他青睐呢。我还记得，当时他是一位受人爱戴、年轻英俊的教师，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童子军教练时穿的那身制服。校舍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上面也是一位穿着极为合身的制服、俊美无比的童子军教练。我不知创作那幅油画的美术老师是不是以南加先生为模特儿的。虽然脸形稍有不同，可我们还是称它为南加先生的画像，因为他们二者同样漂亮，同样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童子军教练。画上的人物双臂交叠在胸前，右脚抬起，轻松而自然地踏在一墩子整的树桩上。画框的四个角落里点缀着鲜嫩、红艳的木槿花；框下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题词：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这是我的信念。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席之地（在那些日子里，搞到一个议席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席位的价值）。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为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六零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普选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

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想下调咖啡价格，损害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冒输掉选举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千五百万英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广播。自然，当时无人知道真相。报纸和广播都在宣扬内阁总理的一面之词。我们当时也同仇敌忾。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对领导人的信任投票，要求颁布一项拘留法，以便对付那些恶棍。整个国家都支持内阁总理。示威游行和抗议的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就在这时，就在这遍及各地的抗议声中，我首先注意到了一个危险而不吉利的新征兆。

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时事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那群“匪徒”，即受到这种谴责的、解了职的部长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大学学历的专门人才（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篇社论的剪报）。